

## 危机之后？

---

罗伯特·佐利克  
世界银行集团  
行长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尼采高级国际研究院

2009年9月28日

剧变形成的冲击使得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中存在的裂痕逐渐扩大。有时旧秩序甚至会彻底崩塌。但是，这种趋势可以让各国领导人和人民有能力改变变化的方向。

今天，大多数人认为，爱德蒙·柏克 (Edmund Burke) 的《法国革命论》只不过是指责法国大革命已将一位国王和一位王后送上断头台并掀起“恐怖时期”的序幕。但事实上，当隆隆作响的囚车还未辗过鹅卵石铺就的巴黎的大街小巷，断头台处人群的呼吼还未在巴黎的上空回荡之时，柏克的著作就已于 1790 年问世。

1789 年是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动荡的年代。虽然柏克提出了明智的警告，但是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预期法国将踏向民主宪政体制改革的“英国之路”。

这些巨变产生的影响仍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回荡。一个多世纪以后，据称中国的总理周恩来被问及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时，他沉吟道：“下结论为时尚早。”

今年是 1989 和平变革 20 周年，当年整个欧洲发生的剧变与 1789 年的革命截然不同，促成了冷战的结束。1989 和平变革导致了柏林墙的倒塌、中欧和东欧的解放、民主德国的统一、欧洲的联合、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的回归。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动荡事件正如我的朋友弗兰克福山 (Frank Fukuyama) 教授所言，令人感觉像是“历史的终结”。然而，欧洲的后续发展到欧洲联盟的扩展，建立共同货币以及北约的扩建，而成就欧洲新的历史篇章。

在那个时期中，虽然人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欧洲，但新的历史事件也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为墨西哥提供了根本性的调整，其中包括走向民主以及更深入地融入北美一体化；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提出了新的“开放的地区主义”，使正在崛起的东亚地区与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联系起来；以联合国为基础的联合行动击退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野蛮入侵，为“马德里会议”铺平了道路，进而启动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谈判。那些具有前瞻眼光的领导人，在社会剧烈的变化和发展的趋势中看到了机遇，播撒了这些改革的种子。

我在当时以及之后的经验加强了感觉：大事的发生具有连续性。正像柏克所指出的，世间存在着一种“不仅仅涉及所有生者，还包括所有生者、死者、后代之间的合伙关系”。

结果不是预先确定的，而是取决于所发生的事件以及目的明确的行动。

2009 年，我们经历着一场正在改变我们周遭世界的剧变。这场剧变将给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

当今的剧变并非凭空发生，这些种子早已埋下。

过去的 20 年间，我们见证了巨大的经济转变。苏联，中欧和东欧计划经济体系的解体；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改革；以及东亚地区的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战略等等，促进了从 10 亿左右增长至 40 或 50 亿的人口的世界市场经济。这种转变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是同样也动摇了在 20 世纪中叶形成，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几经修补的国际经济体系。

对于当前面临的困难，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金融危机中的应对措施，或缺乏应对措施。在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下定决心避免再次暴露于全球化的风暴之中。许多国家通过汇率管理和建立庞大的外汇储备来给自己上“保险”。其中的一些变化造成了全球经济失衡和关系紧张，但多年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普遍的良好增长中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

中央银行无法应对新经济中产生的各种风险。表面上看来，他们控制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物价膨胀，而大多数人认为，在鉴别及利用货币政策来遏制资产价格泡沫的方面困难重重。他们认为，一旦大幅降低利率导致泡沫破灭，就业、生产、储蓄及消费等“实体经济”都将受到损坏。而事实证明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

监管和监督机构的政策行动与现实脱节。金融的创新和竞争极大扩展了服务范围，过去通常被忽视的企业和家庭也被纳入其中。但是“理性市场”诱人的简单设计理论导致监管机构严重地忽视了心理学、机构体制、系统性风险以及市场与民众相关的复杂性等现实问题。

和过去一样，今天我们采取的行动必将是未来机遇和挑战的根源。

我们要从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亦不能拘泥于此。面对已经发生的危机我们往往可以兵来将挡，而不是预测未来的危机。唯一肯定的是我们必然要面临一场巨变，并且它将有别于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

今天在座 SAIS 的每一个人，你们都有机会在这场巨变中有所作为，而我也非常期待你们的表现。反思过去，您可能会问：这场危机将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发展？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代表们抓住时机，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代表们在新罕布什尔州花了三个星期，为世界经济的金融和商业关系构建并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机构体系及制度。

此后的六十五年间，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包括 1989 年和平变革），而当前这场巨变将再次调整世界的景观。

其实我们已经体会到各种力量和机构以及在国际合作方面的潜在变化。一方面，这一转变将取决于各方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另一方面，取决于经济的快速复苏；再一方面，取决于谁掌握并利用世界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的人员；最后，还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合作（或不合作）。

危机过后的预期结果与现实状况？

目前普遍认为，危机后的政治经济形势将会大幅提升中国，可能还有印度，及其它大型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间的影响力。据估计，处于金融危机中心的美国，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将会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这一预测有充分的现实依据。中国积极应对此次金融危机，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经济刺激计划和货币政策。中国的国库储备应该足以支持其前期措施的有效实施。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有效推动了其它国家走出危机阴霾的步伐，充分体现了中国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力。

毋庸置疑，当今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与印度的产出占到全球产出总量的 8.5%。它们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发达国家。

然而，中国的未来尚未确定。中国在 2009 年的迅速发展，得益于今年头 8 个月 GDP 的 26% 的信贷扩张。目前，金融危机的洪潮已得到初步缓解，有关方面可能会就此进行调控，以防对资产价值和资产质量造成不良影响，甚至最终导致全面的通货膨胀。中国在 2010 年仍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领导人对这些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其中包括中国及其它新兴经济体对出口型增长的持续依赖。中国要想通过扩大内需，尤其是以刺激消费的方式，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并帮助平衡全球发展，并非易事。受中国保护的服务行业，包括金融服务，限制了企业的投资和参与机会以及生产力的提高。

美国，反过来，是这次经济危机的重灾区。但是美国有着抵御衰退，适应新形势和重新崛起的文化。

美国的未来取决于能否采取适当的措施解决巨额赤字问题，在保证信贷和货币系统不会遭受通货膨胀侵害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复苏，并在彻底改革金融系统的同时确保系统的安全与完善。美国还需要帮助民众适应变化，以便确保它的最大的优势：对贸易、投资、民众和观念的开放。地缘政治学者们将会非常关注相关经济现象，以便了解美国的经济困境正如何削弱美国与其它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合作的信心、能源和资源优势。

日本是因这次经济危机而发生政治动荡的首个工业强国。日本民主党的当选掀开了日本历史上两大政党民主执政的序幕。

日本从二战的废墟中迅速崛起，成为典型的出口增长型“贸易国”。旧的出口增长模式能否在日趋“平衡”的全球经济中保持可持续性，而不严重依赖于美国消费者，目前尚不可知。日本老龄化将引发新的消费需求。实现多极增长的全球经济能够为日本提供众多新的市场，尤其可以帮助其大幅提升利用能源的能力。

对于日本如何制定各党派均认可且可能承担更多责任的外交政策，全世界都将投来关注的目光。日本外交政策的制定可以该国的发展经验为基础。日本可以深化其与东盟中的其它亚太成员国、澳大利亚、中国及韩国的合作关系，并借助与美国的关系维护其国际地位。在非洲、拉丁美洲、中亚以及中东的开发项目也将帮助日本实现国际声誉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欧盟可能后来才意识到，这次经济危机是自 1989 年和平变革以来新欧洲经历的首次严峻考验。但是，欧盟此次的响应速度相对迅速，欧洲的各大机构也可能因此具备更强的风险抵御能力。

中欧和东欧经济体是这次经济危机的重灾区，它们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但是，至少对于欧盟成员国来讲，欧盟委员会、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提供的支持以及世界银行集团提供的协助至关重要。向中欧和东欧邻国投资的欧洲

银行一如既往地提供支持。战略上的有利消息是，通过激烈的内部辩论和谈判，欧洲各国最终承认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此次，重压之下的欧洲并未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

欧洲中央银行在其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 (Jean-Claude Trichet) 的英明领导下，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欧洲中央银行在支持欧洲金融系统、帮助欧元区以外的欧洲人和确保欧元可信度等方面，采取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线。因此，欧元区以外的新欧盟成员可能会极力争取获得它的安全保护。

但是，在严酷的经济时期，欧盟同样会面临非安全因素的挑战。其能源劣势引发的忧虑，恶化了其与东方邻国，尤其是与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巴尔干半岛依然浓烟四起。波斯尼亚局势的恶化可能导致人们对欧盟是否有能力提供安全产生怀疑，甚至在欧洲大陆本土也有这样的担忧。欧盟和土耳其必须就其共同的未来达成共识。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欧洲也将面临移民融合的问题。

东南亚也可能因经济危机的影响而面临类似问题的加剧 – 具体取决于如何抓住机遇。该地区位于印度和中国这两个新兴大国的地理交叉区域。东盟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并已采取各种措施以深化这种融合，甚至不会错过提供外援的机会。

印度尼西亚的地位不断提高，越南的影响力也在日益扩大，这些国家在此次经济动荡中保持了良好运转，与十年前的窘迫境况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依然存在着调整问题和政权更迭问题。此外，还存在其它国家是否承认新兴的东盟这一问题。中国和印度似乎对东盟表示承认 – 但北美和欧盟会持何种态度呢？

对于其它国家来讲，经济危机的长期影响可能有赖于石油商品的状况，尤其是石油价格，而近几年这一产业获得了高昂的回报率。石油价格高达 100 美元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而当石油价格为 30 美元时，它们中的大多数则会陷入严重的困境。当今世界正在竭力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并且石油商品价格随投资人在“资产级别”中的循环往复发生改变。这一现实导致这种对石油和石油商品出口的严重依赖无法为经济体的构建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这些国家能否善加利用高昂的石油回报 – 将之用于实现经济发展的多元化？这些是俄罗斯、海湾国家以及某些拉美和非洲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代表已深刻体会到，对权力关系转变的认识是构筑未来的基石。通过对一战后未履行责任的共同分析，以及对二战后权力的明确评估，逐步形成了该体系的政治基础。权力关系一旦发生变化，与之相关的市场性质就会随之改变，体系也将走向分崩离析。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美元是否仍将是主要储备货币？**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在 1973 年让位于浮动利率，以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尽管在可靠性上存在种种问题，却因其在经济危机期间为投资者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而得以升值。

由于美元享有这种特殊地位，使美国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幸运。在同各国一道为支付预算或填补贸易赤字而努力时，我也在思考，为何美国会忽视自由发行债券及印制钞票这一独特的优势。有关拿破仑的史籍都对其重大战役及战斗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其实那些平淡的历史章节所记载当时英国小皮特执政所采取的恢复信贷政策，才是决定了英国及其盟国的最终胜利。

如果美国想当然地认为美元将维持其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这显然是错误的想法。从未来的角度来看，除美元之外，我们的选择将越来越多。

鉴于欧洲中央银行 (ECB) 近期的表现，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欧元的接受度将会上升。欧元产生的影响部分取决于欧盟各国在未来几年内的竞争力及其金融市场的深度与流动性。人口和经济增长前景也与此密切相关。但在美元疲软之时，欧元融资不失为可靠的替代方案。

除此以外，中国也正在逐步推进其货币的国际化。中国政府正通过货币互换等方式为贸易伙伴使用人民币开展业务提供便利。我们在投资领域同样能看到这样的转变：中国已于本月首次向海外投资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中国政府近期还宣布允许外国公司在华上市，从而迈出了将上海打造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一步。各主要商品进口国可以想见，在上海或中国其它港口城市最终将确立全新的人民币基准指数。

中国的领导人仍将持谨慎态度。其中多数希望保留封闭资本账户的控制力。各类干预和控制工具可能继续在金融与银行市场发挥作用。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中国势必应时而出。经过十年至二十年的时间，人民币将发展成为金融市场上一般重要的力量。

各国及市场也可在特别提款权 (即 SDR，反映主要货币组合) 指定的资金方面进行尝试。

当然，美元现在和未来都仍然是主要货币。但美元的走势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选择。美国是否放弃凭借通货膨胀来解决自身债务问题？美国能否针对支出与预算赤字制定长期规则？国家是否正在恢复健康金融部门的创新、流动性及收益职能，同时不会引发类似巨大泡沫以及体制瓦解的风险？此外，美元的价值也还取决于动态、创新的私营部门经济能带来多少回报。

权力关系在国家内部同样受到质疑。中央银行在这场危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民主政府是否会允许独立的中央银行执掌更大权力？**

联邦储备系统的权力范围涉及创建基金、购置资产、规定全球换汇额度以及开展公共资金支出一般流程以外的交易等方面，美国国会曾对此表示惊讶。

国会与各银行及银行家之间的关系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 时起一向不睦；最终导致 1913 年美国成立中央银行。联邦储备系统在多年努力之后才赢得来之不易的独立。

因此，对于授权美联储监督银行业系统风险及操作货币政策、扩大其权力范围，美国民主政府有所踌躇也不应感到意外。

英国存在有关英格兰银行与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的角色之争。多个国家监管机构参与则会增加复杂性，欧元区国家同样面临这一问题。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当中，随着银行与金融市场日渐成熟，这也将成为一个课题。

在危机来势最为凶猛之时，中央银行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但在处理逐步建设方面尚存在一定问题，包括资产价格膨胀以及监管重大失误。我们还未看到央行能否在避免通货膨胀失控的同时提出恢复举措。

以色列央行行长、此前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的斯坦利·费希尔 (Stanley Fischer) 提出，或可在组织有效的基础上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审慎标准监管工具相结合。另有声音认为，其中难免有一方沦为配角，如将机构合二为一，则或因缺少其它意见而增加犯错误的风险。一些人甚至暗示会产生利益冲突。

上述争论反映出在对待银行和中央银行方面迥然不同的政治传统及态度。美联储当中独立、权威的技术专家将很难在美国获得更多职权。对于最近的危机管理我的理解是，需要赋予财政部更大的权力，才能使各监管机构同心协力。不仅如此，美国财政部还是一个行政部门，因此如其行使的权力增加，也会受到国会和公众更为直接的监督。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另一遗产是全球贸易系统。

它是否能跟上全球经济需求变化的步伐？

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

从积极的方面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孤立主义的灾难性经验为很多政府敲响了警钟：切莫旧幕重演。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热情一向不高。不过这种热情在逐渐升温。

贸易的政治经济集中体现于“自行车原理”：目前大多数国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生产者势力，因而对抗其保护主义力量的唯一办法是努力加速贸易自由化进程。这样，开放市场所带来的潜在裨益可帮助人们实现诸多利益，以反击那些鼓吹贸易壁垒者。

然而如今，世界贸易组织 (WTO) 多哈回合谈判已经几近搁浅。此外，由于多哈回合谈判的日程制定于十年前，因此该谈判的进程难以追上新挑战接踵而至的步伐。我们应尽早完成多哈回合谈判，然后开启新征程。

多哈回合谈判可以削减、规范，甚至取消多年来脱离规则化贸易系统约束的一些农业补贴。它可以适度打开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制造产品及农产品的市场。它可以**将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约束”在一个大为降低的水平**，进而增强互利意识，控制关税大幅上调的风险。多哈回合谈判还可以打开服务市场，削减限制了贫穷国家基本制造业和附加值生产的发达国家关税上限。针对过于自由地对贸易施加限制的规则，多哈回合谈判可以进行更正。上述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些利益将展现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国家通过妥协实现系统性共同利益的能力。

一旦多哈回合谈判得以完成，我们需要立即启动新的日程。诚然，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但是我们需要新的规则，使各国能够在鼓励开放区域主义的同时，抓住面向区域以外**更深入、更广泛的自由化**所能够带来的利益。世界贸易组织需要以不再借助新的碳排放税的方式支持气候变化日程。我们需要对抗当前金融危机所催生的金融保护主义和补贴保护主义。我们需要减轻南南贸易的壁垒。必须扩大服务贸易，使之与发展 and 增长机遇相协调。我们需要向最贫穷的国家提供更多援助，因为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抓住贸易带来的增长机遇已愈加困难。

新日程的建立需要的前期工作由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拉米 (Pascal Lamy) 承担，他负责在世界银行集团的支持下将促进贸易与贸易援助联系起来。要利用降低的贸易壁垒，贫穷国家需要：**区域一体化**（用以为内陆国家建立更大的市场，创造更多进入市场的机会）、能源、基础设施、物流系统、便利充足的贸易融资、标准化的援助和简化的海关及边境手续。过去，在肯尼亚和乌干达两国间办理边境手续需要两天时间。而如今，由世界银行帮助建立的一站式边境哨所使递交时间减少两个小时或更多。

“布雷顿森林体系”由 44 个国家共同制定，而其制定的时代背景是权力集中在少数国家手上。非殖民化的大潮尚处于萌动阶段，少数的几个发展中国家只是历史的被支配者，而非主宰者。那个世界早已一去不复返。当今新的政治经济现状要求建立新的系统。

**金融危机过后，发展中国家将扮演何种角色？**

这场危机凸显出新兴大国与日俱增的重要性，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当然其它国家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实际上，世界经济正在经历“重新平衡”的过程，力图重现两百多年前的相对格局，彼时工业革命尚未开始，北美大陆的新生也仍在酝酿之中。

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应在经济复苏中发挥关键作用。大多数分析人士均预期需求将维持在中等水平，而美国消费者的需求量还会下降。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有融资机会，就能扩大其需求量。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状况允许其进行贷款，它们却无法在不“挤出”国内私营部门的条件下，以合理的价格获得所需款项。而且，70% 的全球极端贫困人口都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借助世界银行集团和区域性开发银行的力量，上述状况将得以改善。

**展望未来，更为平衡并且更具包容性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将因经济多极发展而受益。通过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拉丁美洲、亚洲和泛中东地区的人民、私人企业以及国家都可为世界经济的“新常态”作出贡献。**

假以时日，非洲也能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极。我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听到的诉求都是：非洲人民需要能源、基础设施、高效农业、具有活力的私营部门，以及与开放贸易相关的区域一体化市场。60 年前在百废待兴的欧洲大陆上，也曾出现过同样的呼声。

**在危机之前，一些非洲国家的经济就已持续实现高速增长。当危机的阴霾散去时，这里可能出现新的机遇。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中国某些制造企业正在考虑将生产基地迁往非洲。世界银行集团与中国有关方面也在就开发新工业区的问题进行探讨，以便为这些企业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能源和培训。**

**中国在非洲规划项目前景（包括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时，其它国家也愿意加入其中。巴西愿意分享其农业发展经验。而印度也在非洲兴建铁路。这些行动表明，未来的趋势已初见端倪。**

世界银行集团在全球范围内支持这一发展进程，以此来抵消金融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我们已通过国际金融公司（为私营部门提供服务的世行附属机构）设立一家新资产管理公司，在银行、股票、基础设施以及债务重组等领域进行投资。同时，我们也将对本地（本国）货币债券市场的发展提供支持和投资。目前，较为长期的投资者（例如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已认识到发达市场中同样隐藏着风险，而新兴市场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结束语

此次危机过后，我们可以把握机遇，重塑我们的政策、架构和机制。我们需要抓住时机，构筑新的全球体系，推动 21 世纪“负责任的全球化”，即平衡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集全球之力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为贫困人口提供机遇。这意味着将开放市场与贸易、投资、竞争、创新、企业家精神、增长、信息和思想辩论的成效扩大化。这种全球化必须兼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即在扩大机遇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

但是，“负责任的全球化”无法凭空实现。

在四月份举行的伦敦 G-20 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还在为经济低谷而忧心忡忡。现在，安于现状的心理已取代经济下滑成为新的危险信号。随着危机减退，让各国为“重建更美好”(Building Back Better) 而团结合作将更加困难。上周的 G-20 峰会上通过了一个新的“稳健、可持续与均衡的增长框架”，对此框架的同侪评审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还需要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与协作，其中包括认真考虑全球监测所得结果的意愿。同侪评审需要深化为同侪压力。

气候变化问题将成为此番国际合作面临的第一轮考验。十二月份在哥本哈根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激励措施，协助其走上低碳增长之路。决策者们需要制定出持续性进程的框架，在推动技术变革、适应与发展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

我们需要反映全新多极发展格局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筑这一体系，一方面需要接纳新兴经济力量，使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这些国家仍有数亿贫困人口，在发展方面还面临着艰巨的挑战。构筑这一体系，需要发达国家的力量和支持。但是，这些国家的民众对于沉重的债务负担和竞争对手的出现尚有忧虑，并且认为新经济体必须共担责任。构筑这一体系，需要向最贫困和最脆弱的国家、仍生活在无电状态下的 16 亿人，以及因国内冲突和治理不善而陷于贫困中的“底层 10 亿人”伸出援助之手。

全球金融和货币、贸易体系、兼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气候变化、与脆弱性和冲突作斗争的国家、以及大量其它安全问题。单独来看，每个议题都很重要，但彼此之间又紧密相关。

除非世界各国能够同舟共济，否则无法有效处理上述议题。经济多边主义是另一时代的产物，无法反映今天的现实。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对“多边主义”和“市场”进行现代化的诠释。

正如与会各国上周在匹兹堡所达成的一致，G-20 峰会应该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大国之间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但该峰会不能变成一个孤立的委员会，更不能忽视其它 160 多个国家的声音。

G-20 应在各国和国际机构所形成的体系间发挥“指导委员会”的作用。通过 G-20，能够发现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并有助于培养共同利益点。这一体系不能是等级制度，更不应成为官僚机构。如果有相应的推动因素，其它谈判小组、国际机制或者全球性和区域性机构，也会为解决这些议题作出不懈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世界贸易组织、金融稳定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各机构可向各国发出有关问题的预警、提供相应分析、制定合作解决方案以及协助落实政策。

为体现效率和加强合理性，国际机构也应进行变革。国际机构中的投票权应反映出新兴力量所占的比重和相应责任，同时确保贫困人口有机会发表自己的主张。无论国际机构是在私人企业、基金会和民间团体的体系内开展工作，还是国际机构彼此之间进行合作，均需要透明度和灵活性。

早在危机发生之前，原有国际经济秩序就在奋力应对时局变化。当前的剧变使现存的严峻差距和迫切的变革需要表露无遗。此刻，我们必须跟上这种变化的步伐，继续前进。

现在的问题是，各国领导人能否团结合作，迎接挑战。他们会考虑所代表的国内民众的利益，这也是其职责所在。他们在发现并构筑共同利益的过程中还将面临种种考验，这不仅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应通过“负责任的全球化”机制来实现。



我们正在亲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构过程。这一次所需的时间比新罕布什尔州的三周还要漫长。“布雷顿森林体系”将接纳更多的成员，这是大势所趋。无论下一次剧变为何，它都已在现实中萌发。若不能应时而动，就只能受制于它。